

# 封建社会初期中原文化对云南体育的影响

李晓华

(云南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92)

**摘 要:** 战国末至西汉末、东汉初是我国封建社会建立的初期阶段。期间,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明曾对以“滇”文化为代表的云南文化施以过全方位的重大影响。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云南古代体育得以极大的丰富。

**关键词:** 封建社会初期; 中原文化; 云南体育

**中图分类号:** G812.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01)03-0052-03

## Discussing about the influence of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to yunnan ancient sports during the initial of the feudal society

LI Xiao-hua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2, China)

**Abstract:** It was initial stage of feudal society from the end of the warring states to the end of western han dynasty. During this period,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had been influence to yunnan ancient sports in every respect. The issues discussed here are from the point of ancient sports.

**Key words:** the initial of the feudal society;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yunnan ancient sports

“滇”是西汉以前分布在滇池区域的一个奴隶制部落的名称。而在当时,代表中国文化的中原地区已经跨入了封建社会的门槛。本文所指“封建社会”是就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制度而言。

考古资料证实:“滇国”出现的时间最迟不晚于战国初期,战国末至西汉初为全盛时期,西汉中期以后逐渐衰落,西汉末至东汉初渐被中原王朝的郡县制所取代。西汉是中原与云南文化广泛交流的起步时期,当时的“滇国”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甚密,“滇小邑,最受宠。……汉诛西南夷,国多灭矣,唯滇复为宠王”。<sup>[1]</sup>从1955年至1960年,考古工作者对位于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两地的“滇人”古墓葬群进行过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经鉴定,两处墓葬,除少数为战国时期的以外,其余大部分是西汉后期的。在所出土的大量文物中,以石寨山6号墓出土的汉武帝钦赐金质“滇王之印”尤显珍贵,《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实物的出土印证了这一史实。在出土的众多青铜器物中,有“滇”式的,也有纯汉式的,在两地均出土过刻有汉族人名的印章,经有关专家鉴定后认定:“它们或是模仿内地而制,或就是当时寓留云南的汉人之物”。<sup>[2]</sup>由于文字发展水平的落后,“滇国”发达的青铜铸造工艺必然充任其文化的载体,这在中国青铜

史上仅见于“滇”文化。如果说“滇”文化是同时期云南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各民族文化的代表<sup>[3]</sup>,那么,青铜文化则是“滇”文化之精髓。本文正是依据青铜文化所沉淀的信息,探索这一时期中原文化对云南体育所施加的影响。

### 1 中原文化对云南体育影响的主要内容

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云南古代体育的内容得以极大地丰富。

(1) 舞蹈。商周时期,舞蹈曾盛行于中原地区的庙堂。此遗风在西汉时期大量显现于“滇国”青铜器,并清晰留下中原文化所烙下的印迹决非偶然,当为“滇”贵族“礼失而求诸野”之体现。

羽舞:由于商以玄鸟为图腾,所以在跳祭祀祖先的舞蹈时要手持或头戴鸟羽。至周,发展成六“小舞”之一的“羽舞”。在石寨山 M12:1 铜铎上有类似“羽舞”的图像。这面铸造于西汉时期的铜铎上有一圈舞蹈人物,共23人,均头戴羽冠,其中一衣着长至脚踝滇式对襟外衣、腰佩长剑者当为领舞者,余均赤裸上身、跣足、腰部系一条前短后长的布条。领舞者后面的14人均左手持鸟羽。再后面8位舞者则右手持鸟羽。图像中的舞人不论左、右手所持的羽毛每根都是半分開的。这仿佛就是《周礼·春官·乐师》郑玄所注“羽舞者析

收稿日期:2000-09-30

作者简介:李晓华(1956-),男,河北隆尧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体育史、体育教学与训练。

羽”的图解。

**旄舞:**周朝的“小舞”之一,以舞者手持牦牛尾舞蹈而得名。在西汉时期开化铜鼓鼓面主晕圈内刻铸的乐舞饰纹上,有4组站立者,每组4人,除一人双手抱吹三管芦笙外,其余15人均头戴羽冠,腰系前短后长的布条,手持一根牦牛尾巴而舞,其场面与《周礼·春官·乐师》郑玄所注“旄舞者牦牛之尾”的状况基本相似,所不同的是吹奏芦笙在周朝的“旄舞”中是没有的,这是滇与中原两种文化融合的体现。

**人舞:**周朝的“小舞”之一,舞者不拿任何舞具,以手袖为威仪。石寨山 M12:2 西汉时期“铜鼓形铜贮贝器”盖中铸有“人舞”图。在器盖最外一圈有一组舞者,这些跳舞者均身着典型的滇族妇女装束:头发从前额中部分开,往后面梳理在后颈上重叠,梳成“银锭式发髻”。她们身穿宽大、且长至膝下的滇式对襟外衣,衣袖宽而短,仅长于肘,衣服上有若干垂直线条,耳朵、手腕均佩环戴镯。舞者们双臂平举,手掌张开,掌心向外,徒手,以手袖替代舞具,这与“羽舞”、“旄舞”舞者赤裸上身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是对《周礼·春官·乐师》郑玄所注“人舞者,手舞”最好的图解。

**干舞:**周朝的“小舞”之一,其特点是舞者持盾。石寨山 M14:1 号铜鼓鼓身第5晕铸羽人装束舞者6组,每组1至2人不等,他们有的手持干而舞,有的手持干、一手执戚而舞。在另一些铜鼓上出现的舞者,有的一手舞干,一手舞铍;有的一手舞干,一手舞矛……李家山有一具鼓腰部铸着6组执盾的羽人,他们戴的羽冠特别高,而且非常像鸟头。这些羽人所执的盾牌、矛、斧等兵器,是舞蹈的道具,舞姿是战斗动作的模仿。舜时就有禹征有苗,“执干戚舞,有苗乃服”的故事。尽管阶级社会的战争和原始部落间的械斗有着本质的差别,但以歌舞和祭祀去激发士气,祈福求佑的初衷却是相同的。即使是在中原地区,不但西周初期的武王“歌舞以凌”而迫使“殷人倒戈”,甚至到了春秋时期,也还有“国之大事,在祈与戎”的说法。据《诗经》和《周礼》记载,汉族的古典舞蹈大体可以分作两大类,即文舞和武舞,文舞要执羽毛,武舞要执干(盾)、戚(斧类兵器)等兵器。铜鼓上的盾牌舞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了与汉族古典舞蹈的一致性。

**翔鹭舞:**汉族很早就把鹭与鼓和舞蹈联系起来。《诗经》曾以“振振鹭,鹭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乐兮”的词句描述过公元前7世纪中叶鲁国国君僖公宴请群臣的情景:持着鹭鸟羽毛道具的舞伎,排成队列,翩翩起舞,宛如鹭鸟上下翻飞,伴舞的鼓发出咽咽之声,群臣醉意朦胧,也手舞足蹈起来,十分惬意。在河南信阳和湖北江陵楚墓中都出过以鹭作装饰物的鼓架。文献和考古资料说明,以鹭鸟作鼓装饰的习俗大约源自东周,只是中原地区饰鹭的鼓都是皮鼓。

尽管目前尚无确凿的史料能够证实曾作为中原饰物的鹭鸟是如何驻足于云南铜鼓的,但将鹭和鼓联系起来的思想意识和艺术传统在这一时期传入云南应当合乎情理,因为中原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交往古来有之。春秋战国时期,铸造石寨山型铜鼓的“滇族”正处于奴隶制社会阶段,鹭鸟遵守秩序,象征着奴隶制的等级不可改变,这种观念因合奴隶主之意而被借用,这样,翔鹭纹便很快被铸造在象征统治者权力

和财富的重器——铜鼓上。李家山 M24:42B 铜鼓腰部铸有“翔鹭舞”的图像:舞者头饰鹭鸟蓑毛、羽翼,腰系鹭鸟尾衣饰,生动地摹拟出鹭鸶飞翔、群鹭嬉戏和群鹭在长途飞翔时排成的队形。晋宁石寨山 M1:1 号铜鼓的腰部,有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原始的鸟舞。如联系到铜鼓上的装饰推断,这种鸟舞也许就是鹭鸟舞。鹭鸟舞在中原地区流行很早,综合《诗经》对此进行过的形象描述分析,云南的鹭鸟舞或许与中原舞蹈有着某些内在的联系。

**圆圈舞:**中国古代一个基本的哲学观点是对宇宙“天圆地方”的认识。因此,“圆”也就成了中国古典舞的主要内部结构特征。在李家山出土的一件镶嵌绿松石的圆形铜扣饰上,铸有18个人手拉手,衣着尾饰的“圆圈舞”高浮雕图案。把18位舞者雕铸在一件青铜器上决非随心所欲,而是刻意安排的,其中心思想就是要突出主题,即:这18位舞人是在围着圆圈跳“圆圈舞”。

(2)投壶。投壶起源于西周时的射礼,最早的投壶是以短矢投向宴会所用之酒壶,后来逐渐发展成一种游戏,矢和壶具也专门化了。令人惊讶的是,在遥远的西南边陲竟然也发现了这种曾盛极中原的古代游戏!,在晋宁石寨山出土过两具青铜壶, M14:3 铜壶高40.2 cm,底径11.5 cm,腹径17 cm,口径5 cm。底部为平底,腹部呈圆球形,往上渐细,颈部细且长,口上还套上一个喇叭形套子。M17:24 铜壶与 M14:3 铜壶形状相同,高度相近,不同之处是腹部刻有精美的凤、鹿、豹花纹,壶颈没有套子,有关专家鉴定后确认:此系供投壶游戏所使用的壶具<sup>[4]</sup>。

(3)角抵。汉族“角抵”是指角力、角斗摔跤、相扑等比较力量的运动。在河南南阳等中原内地出土的汉画像砖石上人与人、人与兽角抵的图像已人所共知,而在云南古代青铜器上的斗兽图像却知者甚寡。石寨山 M13:172 青铜剑的刃部,有用阴线所刻人、猴与猛虎搏斗的图像。剑刃两面的图案基本相同,有裸体斗兽士一人,背部和下肢刺有花纹,左手执青铜短剑,扑伏在老虎身上,右肩顶住虎颈,使虎头不能动弹,双腿勾住虎足,左手所执铜剑正要刺入虎躯。斗兽士所驯养的一只猴子,正用两前肢紧紧抓住虎尾,并用利齿狠咬虎尾。石寨山 M6:21 青铜剑在剑刃的两面也雕刻了两幅斗兽士率猴斗猛虎的图像。其内容与 M13:172 基本相同,但更为精彩:斗兽士所执的利剑已经有一半刺入虎颈,而斗兽士此时却把头向上扬起,另一只手往上举起,似乎在向“观众”示意,其面部表情也被刻画为洋洋得意,俨然一副胜利者的面孔。剑随主葬,表明是主人的心爱之物,而该墓主正是“滇王”本人。应当指出,青铜器上的斗兽和猎兽有着明显的区别。例如石寨山 M17:14“八人猎虎镂花铜饰物”上,猎虎者均为盛装贵族装束,其中6个人均手持长矛,6支长矛刺向猛虎,还有两条猎犬帮忙,咬住虎背。尽管如此,仍有2人被猛虎掀翻在地其中1人的颈部已被猛虎咬断。这是写实性的猛虎。因为8位猎手手持长兵器外加2只猎犬才能制服并格杀猛虎,何况还有一死一伤的损失。这与只身搏虎的斗兽士是不能比拟的。

石寨山还出土这3件观看斗牛的青铜看台。中原一带

汉画砖石上的图像表明,汉代斗兽主要在室外进行,云南亦然,其中M3:140所铸的就是一个露天看台,看台高5.7 cm,宽9 cm,分3层。上、中层是观众看台,下层是斗牛池。在上层坐着10个人,坐在中间的两位大概是贵族,两旁各坐的4人与中间隔有一定的距离。中层共有9个人,其中两侧各坐有4个,中间的1人俯身跪坐,双手各持一扇门轴,正在开启下层斗牛场的两扇门。门外,一头牛正欲冲入场内,前蹄已踩在下层场内的地面上,低头挑角狂奔,身体的后半部还在场外。两层观众的表情判然有别,上层观众正身端坐,目不斜视,而中层两侧的人都在紧张地注视着中间开门者的动作。下层在入场的门洞两侧也站、或蹲着4人。M7:33则是一座双层看台,高5.6 cm,宽9.5 cm。上层为观众看台,下层为斗牛场。看台上坐有11位观众,另有1人已将入场的两扇门全部打开。一头牛正从打开的门洞缓缓入场。下层门的两侧各站立5人,每人头上插着极长的一束类似发辫的装饰物,手中均抱一个圆形物体。据分析,这些人当是斗牛士,他们手中的圆形物可能是斗牛的道具、器械一类的东西。

(4)秋千。秋千是中国传统的民间游戏,其起源,众说不一。《古今艺术图》载:“秋千,北方山戎之戏,……齐桓公(公元前685—公元前682年)伐山戎还,始传中国。”1971年,在江川县李家山西汉古墓群中发掘出一面铜鼓,这面铜鼓的腰部有一组4人同玩一个磨秋的形象:在地上竖着一根高木桩,顶部装有转轴,轴上系4根绳索向四方伸出,绳末梢安有圆环,4个头戴羽冠的人双手各持一个圆环飞快旋转。这件文物当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描述秋千活动的实物资料,证明云南最迟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了秋千活动的开展。

(5)军事体育。在“滇国”出土文物中,兵器的数量最多,其中绝大多数是青铜器,也有少量为铜铁合制器和纯铁器。大量兵器的出土,一方面说明了当时军事的重要,也间接体现了练兵方式的多样,这些兵器中的一部分也与中原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

铁戟:李家山曾出土过一件长35.4 cm,整体成“卜”字型的铁戟。这是中原地区铁兵器中最常见的一种。

铜钺:铜钺多见于商周时期的中原地区,除作兵器外,也用于仪仗和刑具。“滇国”墓地出土铜钺的数量较多,刃部多为新月形或扇形,銜部均有花纹,銜侧多圆雕动物装饰,如水鸟衔鱼、猴衔蛇及狐狸等。既为装饰品,亦作器纽供系纛饰。木柄作弯曲形,多取自树枝的叉丫部分,有的表面涂漆,装柄及使用方法与斧同,主要用于砍劈。

铜锤:李家山出土一件身长26.3 cm,銜高9.6 cm的铜锤,锤作空心圆筒体,其上有菱形镂孔,使用时横打、竖击均可,与中原地区的兵器长锤相似。

弩机:云南古代和近代少数民族均较普遍和熟练地使用过弩机,直至现在,云南少数民族运动会上仍有射弩比赛项目。“滇国”墓地出土有少量的铜弩机,多来自西汉时期的中原地区,有的较完整,有的仅存上面的零件。李家山出土过

两件弩机,机廓后端及悬刀、机牙上均有刻铭,其中一件铭文为:“河内工官二百二十丙(柄)”;另一件为:“河内工官二百□□丙”。汉代的河内郡是当时手工业较发达的地区,传世款识“河内工官”的铜弩机颇多,这在《汉书·地理志》中有载。李家山出土的这两件弩机是中原地区监造、后来远传至边疆的确证。除了发现有“河内工官”铭文的弩机外,也有的刻“舞阳”、“□十三年”等铭文,毫无疑问也是中原地区传入的。说明当时“滇国”尚不能生产弩机,或产量有限,或质量较差,不得不从内地引进部分优质产品。

## 2 结语

在“滇国”存在的大约500年间,发生过与文化交流有关的3件大事:先是战国末年的庄燧入滇,接着是秦代“五尺道”的开通和设置官吏,后来是汉武帝时通“西南夷”及郡县的设置,其中以汉时的交流最为频繁。大批汉人入滇、交通的开辟和汉王朝的直接管辖,使中原文化加快了向滇池地区传播以及“滇”人对此文化吸收的速度。

封建社会初期中原文化的影响集中表现为:极大地丰富了云南古代体育内容。究其因,首先由主观条件决定,即奴隶主贵族出于对自身利益考虑而主动接受。“滇国”统治者十分看重维系奴隶制的经验,对凡与此相关的文化均持“来之不拒”之态,因此,诸如“羽舞”、“旄舞”、“人舞”、“干舞”、“翔鹭舞”之类的中原古代体育内容得以在青铜器上大量显现也就理所当然了。就客观而言,一是文化影响的必然性:自战国步入封建社会至西汉,中原的封建制度的根基已渐趋稳定,而当时作为云南文化代表的“滇国”尚处在奴隶制时期,依据文化由高向低的传播规律,这种包括体育在内的文化传播趋势是必然的;二是文化影响的滞后性:所受中原文化影响的云南体育,在内容表现的时间顺序上与中原文化有所差异,譬如,在西汉时期归于“百戏”的角抵已经发展到人与人角力的高级阶段,而云南仍停留在中原也曾经盛行过的人与兽角抵的低级而野蛮的阶段,过时的庙堂舞蹈依然在“滇国”盛行……这是由社会进程时间差的客观性决定的。

## 参考文献:

- [1] 司马迁. 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M]. 北京:中华书局, 1959. 2997.
- [2] 汪宁生. 云南考古[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0. 62.
- [3] 编写组. 云南各族古代史略[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1977. 256.
- [4] 李昆生. 云南艺术史[M].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5: 129.

[编辑:邓星华]